

《王丹狱中回忆录》

目录

序	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
第一章	初入秦城监狱
第二章	诗与心情
第三章	患难之交
第四章	铁窗墨香
第五章	狱中轶闻
第六章	寂静中的骚动
第七章	大审判
第八章	告别秦城
第九章	新的环境
第十章	新的难友
第十一章	内心的潜流
第十二章	漫漫长夜
第十三章	重返自由

岁月苍苍——王丹母亲的回忆

∞ ∞ ∞ ∞ ∞ ∞ ∞ ∞ ∞ ∞

第一章 初入秦城监狱

公元1989年的6月4日，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就在这一天
的早上，我离开了学习、生活了两年的北京大学，踏上了逃亡的旅程。在将近一个
月
的时间里，为了躲避当局的全国追捕，我辗转于大江南北四个省市，最终回到了
北京
。这一“自投罗网”之举，终于使我开始了生命中一段奇特的历程。

我是1989年7月2日在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附近被捕的。先是押到昌平
县小
汤山一个秘密处所，7月3日夜里转移到秦城监狱。从这一天到1991年4月
2日
，我在这座中国最高监狱中被关押了一年零九个月。在这以后，我被转押至北京
市第
二监狱开始正式的服刑生活。至1993年2月17日被当局以“服从管理”和
“积

极参加劳动”为由假释出狱。

人的一生，难得遇到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因此一旦适逢其会，往往会在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现在距离我被捕已有五年之遙，但当时的经历和感受我仍记忆犹新。

应该说，对于自己的被捕入狱，我早就有思想准备。早在开始在北京大学主办“民主沙龙”时，我就清醒地估算过自己行为的风险性。1989年上半年我邀请老资格的民运人士任畹町到北京大学43楼430室参加“民主沙龙”时，就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向他请教过一旦入狱应该注意的事项，因为我知道他曾因参加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而被判刑四年，在这方面具备经验。记得当时他告诉我“如果单独关押，一定要坚持练习说话，以免长期不说话导致口齿不清”。八九学潮爆发不久，当局的“四·二六”社论出笼，使我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做好了随时被捕的思想准备。四月底在高校中就有小道消息流传，说政治局会议上点了吾尔开希和我的名，甚至有人说已内定吾尔开希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我则更为严重，是“颠覆政府罪”。这类消息的可信度虽然不高，但我绝对相信一旦运动失败，当局不会放过我。记得我还曾向也因参加民运而被判过刑的陈子明询问过政治犯在大陆监狱中的待遇，子明告诉我“政治犯不会受一般刑事犯的歧视”。

“六·四”以后，当局在全国通缉以我为首的21名青年学生，正在外地逃亡的
我已经明白，这一次我是无论如何也要进监狱了，所以七月二日那天，从发现被“尾巴”盯上，一直到被便衣扭住胳膊，我始终没有惊慌失措。在福绥境派出所，我听到便衣在电话里大声向上边汇报喜讯，居然说“小王被抓住了”！这个令人奇怪的“亲昵”称呼还不禁令我暗笑。押往小汤山的路上，他们一直按著我的头不许我向两边的窗外看，这时我就默默地在心中告诫自己，要做好应付各种可能性的准备。在小汤山

等候第一次审讯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平静，此时的心情可以说要比东藏西躲的时候踏实得多，坦然得多了。闲坐无聊，我还向看管人员要来一本我新买的“读者文摘”。到现在我还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一卷在手，我看得津津有味，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七月三日夜，在深沉的暮色中，我被押送到秦城监狱。

尽管他们拒绝透露羁押地点，但大致方向——北京的西北方我还记得，再加上过去对秦城监狱有过不少耳闻，所以我心里大致可以猜想得到这里就是秦城——一座浓缩了中国四十年政治上的风雨坎坷的监狱。

我一生中都将记住1989年7月3日傍晚这一时刻，它在我生命历程中打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现在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回顾那段不自由的生活，心中真是感慨万千。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著名异议人士张显扬于1988年5月在北京大电教报告厅参加“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社会动荡时期，能够扮演为数不多的几个悲剧角色之一，我感到无上光荣。”此时我也有同感。失去学业，尤其是失去自由是一件可悲的事，但这种“悲”绝不是悲哀，而是悲壮。能够把个人的不幸与民族的悲壮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至今仍感到无上光荣！

车子通行无阻地驶进秦城监狱一道道大门，停在一座灰色小楼前。我先被带到类似传达室的一间屋子里，受到极为仔细的搜身检查，腰带和鞋带也被拿走，随后又发给了饭盒，塑料勺，手纸和几件贴身的换洗衣服。捧着这些东西，我随着管教人员进入楼里的一道铁栅门。好奇心使我一边走一边打量着四周。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天完全黑了，狭窄的走廊里灯光昏暗，右边是一排仅有一人宽的小门，那显然就是牢房了，我们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引起沉重的回声，整个气氛显得阴森而压抑。

“分配”给我的是一筒的第一个房间——六号。这是一间约有五平米左右的小屋，窗口相当高，玻璃涂上了白色的“腻子”，靠窗的墙边有一排暖气，旁边就是床。所谓床，实际上是一层铺在地上的木板，类似日本的“榻榻米”，可以并肩躺下两个人。从床到门口有两平方米左右的空地，靠西边的墙前有一个水泥砌的洗手池，安有自来水龙头；从洗手池到门口的墙角有一个坐式搪瓷马桶，没马桶盖。门有两道，外面是一道木门足有一指厚，门的上部有一个镶有玻璃的小圆孔，如同日常家庭使用的防盗“猫眼”一样，供哨兵和管教向内窥视；下部有一个可伸进一手指的小木门，供送饭进来之用。里面是一道铁栅栏门，这道门平时总是锁着，除非提审，连哨兵也不许擅自打开。后来我常想，如果发生了地震，我们根本别想来得及跑出去。屋内四面都是白墙，显然是新粉刷过。在广场上绝食、静坐的时候，曾听说过当局为了作好镇压的准备，已经腾空了几座监狱。为此北京科技大学的十几名学生还去徐向前元帅家询问，遭到断然否认。现在看来，至少是秦城显然已提前作好“接待”我们的准备工作了。后来我才知道，每一个筒道有六、七个房间，像六号这样的是最小的，专供单独囚禁之用。其他号都有六号两倍大，人多时可以关十几人。我曾听不止一个哨兵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过，部队里只有团级以上的军官犯了罪才有可能如此单独关押。看来在当局的眼里，我的“级别”还不低呢！

进入这间小小的牢房，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忽然想起了中学课本上的一篇文章——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第一句：“走过来是七步，走过去也是七步。”这是写他当时被关押的那间牢房的长度。为了作一个“中外监狱设施对比”，我放下东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也用步伐丈量了一下室内的面积，结果惊讶地发现从床到门口也是七步。当然，这是七小步。

三年零七个月的狱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前面说过，对于被捕，入狱，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现在终于坐到了监狱中，我依旧内心坦然。我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在中国大陆，政治文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反对派拥有言论自由的程度；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不想对非正义，非民主的行为保持沉默，就要有遭受压制的思想准备。因此，我把入狱看作是自己介入民运工作的一个必经阶段，看作为一个异议者在中国当代政治实践中的一门“必修课”。我想，既然我已选择了这条路，就必须承受路上无可回避的坎坷。我在三年零七个月的铁窗生活中，精神状态始终良好，内心能够一直比较坦然，平静，是与我这种充份的思想准备分不开的。

在被通缉追捕期间，我也曾考虑过自己的处境。当时的大陆正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不少人基于那种气氛，以为像我这样的“首犯”一旦被抓到，很有可能被“就地正法”，因而为我的命运忧心忡忡。我虽然并不认定事情会有这么严重，但也在心里作好了应付各种可能性的准备。进了秦城的第一天，我就在心理上作了两种精神准备：第一，走上秘密刑场；第二，度过漫长的单独囚禁生活。以后的经历比这两种都要好一些，当时我的确想不到三年以后又能够坐在家里的书桌前看书，写作。不过，我不会为这种“意想不到”而感谢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不少事情是人所不愿而不得不做的。

我作了死的准备，而且自信即使真的面对枪口，我的内心仍会保持平静，因为我没什么可后悔的。自从得知“六·四”流血，大批市民与学生赴难的消息以后，我的心情一直十分沉重。在以后的逃亡生涯中，我的脑海里总是不时地浮现出一位同学向我描述过的场景：一排排的市民和学生在长安街上高举红旗迎着坦克和呼啸的子弹向前冲，一个倒下，另一个又上去，鲜血染红了旗帜……。我从来不讳言，对这些市民

和学生，我在内心深处有着沉重的负疚感，因为六月三日夜我没有在广场上与同学
们并肩赴难，因为我本来应该第一个倒下的，但却成了生者。我一直呼吁同学们
坚奉
非暴力主义原则，最后到底还是有人成了暴力的牺牲品。如果当局判我死刑，我
会有
一种心灵上的解脱感，我会觉得更对得起死难的人。另一方面，我很推崇大陆作
家周
国平的一句话：“人生的意义在于密度，而不在于长度。”我虽然当时年仅二十
岁，
但亲身经历并积极参予了这么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民主运动，即使死去也值得
了，至
少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真正地生活过。”

当然，我也只是作好死的准备而已，事实上我对客观现实并不悲观。我相信
时代
在进步，黑暗不可能再重演。我曾用一支狱方发给写交待材料的园珠笔芯写下
“致父
亲”，“致母亲”两首诀别诗，后来抄在一本地图册上。可惜这本地图册很快即
被狱
方没收，因为我还在上面写了一些总结“六·四”失败的教训的话，以后开庭审
判时
，居然把它作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证据”，列入了罚没物品的清单中，所以这
两
首诗也就失传了。但大致意思我还记得，就是劝父母不要悲伤，要相信长夜漫漫
也终
将有尽头，要耐心地等待儿子归来。

开始过狱中生活，我最担心的就是身体承受不住。当时的伙食很差，一天三
顿都
是玉米面窝头（注1），而且有时量也不够，……。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我想要
身体
不垮下来，就必须督促自己尽量多吃一些；另一方面，就是要坚持锻炼身体。对
我的
单独囚禁如果说还有一个好处的话，就是活动空间比别的监号相对大一些，因此
每天
可以利用这点有限的室内空间做一些锻炼运动。

另外一种担心就是精神上的“瘫痪”。我害怕因为长期关押，导致精神崩溃，
丧
失意志和活力，甚至失去健全的思维能力，对此我给自己订了几条“行为守则”：
包
括“要往远处看”，“在对方（指审讯人员和狱方）面前永远保持微笑”等等，
时常

在心中默诵几遍。闲得无聊，我就一个人对着窗口哼自己想得起来的歌曲，尽管
荒腔
走板的，倒也乐在其中。记得当时我最喜欢哼的是电影《小街》的主题歌（注2），
那优美的旋律可以把我带回到童年的回忆中，暂时忘却眼前的灰暗世界。而哼得
最多
的要属《国际歌》（注3）。每当感到无聊，消沉的时候，我就哼几遍《国际歌》，
马上就感到仿佛又回到了红旗招展的天安门广场上，因为广场广播站每天都要几
十遍
地播送这首歌，于是又有了热血沸腾的冲动。一直到现在，听到这首歌，我仍有
这种
感受。据说“六·四”以后，这首共产党的“圣歌”也成了敏感的东西，卡拉O
K歌
厅的革命歌曲中也找不到它了，这真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不幸而言中”的事情很多，我与书的关系就是一例。记得
19
89年的上半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因为买了不少书而又没有时间看，
常常
对人家戏言：“我买这些书是为了日后进监狱时看的。”没想到半年以后，此话
成真
。在三年零七个月的铁窗生涯中，我读了近一千本书，其中相当一部份就是我以
前买
下而没有来得及看的书。说上述话时我正积极投入校园民主建设，忙于组织“民
主沙
龙”，筹办《新五四》月刊，成立“当代社会问题研究社”等活动。这些活动本
来是
极为正常而又正当的，但我在从事的时候却有一种将为之而坐牢的意识，而在不
久之
后居然就成了现实，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和国家的幸。

我从小就嗜书成癖。母亲工作的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个藏书相当丰
富的
图书馆，小时候，每次母亲带我去馆里，我就一头栽入书架与书架之间，一本本
翻阅
各种书籍，因此我可以说是在书库中长大的。这种读书癖好的养成，对我的狱中
生活
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和双重的。

一方面是，在囚禁生活，尤其是单独关押期间，缺乏人与人的交流和思想的
切磋
，时间一长，难免有孤陋寡闻之虞，这时书刊杂志对我来说，就成了整个外部世
界的
代用品。我在一首小诗中写道：“身居咫尺地，心怀四海情。”就是因为尽管身
陷图

固，但在书中，我却拥有一个广瀚的世界；人失去了自由，而心却仍旧可以自由地飞翔。看一本书，就是一次与作者的交流，这填补了我的寂寞空间；看一本书，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旅游，它可以令人保持内心的活力。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少有身具知识分子和政治反对派双重身份的人仅仅因为坐牢而改变自己的信念的，这恐怕与能够从书中汲取到支撑自己的意志的养料有关。任何专制的手段都无法箝制住心灵的自由，而心灵的自由正是社会走向进步的开始，也是专制制度走向腐朽崩溃的催化剂，这也就是专制制度不可能长期占据历史舞台的原因之一。

入狱的最初一段时间，确实感到十分寂寞。因为一下子从那么轰轰烈烈的场面转入孤单一人的环境，这个变化太突然了。所以我特别思念过去的同学和在八九民运中并肩奋斗的朋友们，也很想知道他们的处境如何。

注：

（1）玉米面窝头：用晒乾的玉米磨成粉状，加入少许水合成，塑成圆锥状，底部有凹洞的形状，蒸熟后配上咸菜或稀饭吃。

（2）电影《小街》主题歌《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啊……啊……，每当我唱起这首歌，心中充满欢乐，啦——啦——。”

（3）国际歌：激励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革命诗歌。全诗共分六节。第一节号召无产者“为真理而奋斗”……；第二节指出“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第五第六节号召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要做历史的主人，把一切剥削者消除干净。

∞ ∞ ∞ ∞ ∞ ∞ ∞ ∞ ∞ ∞

第二章 诗与心情

一提起秦城监狱，很多人会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其实它既有镣铐狗吠声交错和高墙电网相连的一面，也有环境幽静，甚至景色优美的一面。对周围环境的感受是与人的心情息息相关的，热恋中的少女看什么都是光明美好的，而泰山上的乞丐也无从发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叹。我在被关押期间心情始终比较平和，因此秦城监狱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后者。

秦城监狱在北京市北部昌平区境内，这是一座高墙围绕起来的大院子，背面有几座连绵起伏的小山丘，前面是一条河水极为清澈的小河蜿蜒而过。由于周围一大片空地都属于“闲人免进”的重地，所以在院中听不到什么嘈杂的人烟之声。我被关押的地方是一幢三层U形小楼，在U形的中间是一处小花园式的院落，里面种了不少高大的杨树和低矮的苹果树，地面上野生了不少杂草，院落中间是两排相互隔开的露天小屋，作为放风的场所。这种院中套院的格局使得这里的环境更为安静。整个秦城监狱的绿化工作搞得相当不错，种了很多树，每到春天的时候，从三层楼望出去，满眼的绿色如茵，简直像一座公园。

我出狱后和一位“秦大校友”聊天，说起在秦城时最难以忘怀的一幅景色，结果一致认为秦城的黄昏。现在一闭眼，我还能清晰地记起那幅美丽的画卷。秋日傍晚，四、五点钟的时候，从半开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大群的归巢麻雀在落叶将尽的稀疏树梢间上下翻飞，桔红色的夕阳把半边天空染成一片金黄。这种色彩与窗外世界的静谧（习以为常的鸟鸣已经成为静谧的一个组成部份）融和在一起，总是给我的内心以一种强烈的震撼。带着这种难以言表的感受，我常常独自站在窗前，静静地目送夕阳的西下，直至夜色的降临。

自由是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的。外在自由是相对的，而内在自由是绝对的。当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被剥夺了的时候，一个人对自由的全部热爱就会加倍地倾注到对内

心世界的自由的追求上。秋日黄昏的美毫无雕琢粉饰的痕迹，它的美源于真实，而真实又来自于自由。同样，对美的静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心感受也是自由的，即使在逆境中，在一个最肮脏嘈杂的地方，一个内心自由的人也可以体会到生活的美。

虽然自由如此美丽，但当我们身处自由之中时，由于司空见惯，我们往往不能认识到这种美。而恰恰是在不自由的时候，倒是可以深刻地领悟自由的美。这样，在秦城监狱的窗前，在大自然与人的心灵的沟通中，自由和美结合到了一起，在我心中融和成一根精神支柱。我相信丑恶和黑暗的东西永远会存在，但永远不会长期占据上风；真正引导人类及其社会进步的是真善美的东西。既然在秦城监狱这样的地方，都能看到秋日黄昏这样美丽的景色，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暂时的乌云翻涌而对世界的美好前景悲观失望呢？

在阴暗的世界中找到美的感受，这也是一种极为难得的乐趣。

离开秦城已有两年半了，但秦城监狱留给我的记忆依旧清晰而深刻。春天时树梢上的嫩绿幼芽带给我的欣喜；夏天时夜晚院子里传来的啄木鸟的“梆，梆，梆”声如打更般的“催眠曲”；秋天蟋蟀在床板下“劬劬”的叫声；冬天雪落时分，从窗口望去一片苍茫与凄怆，这一切都将成为我终生的记忆。问起许多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大家都说非常怀念那段时光，我想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曾在那里为我们的理想付出了青春和其它宝贵的东西。在那里，我们曾为中国的历史史诗写下了永不消失的一个篇章，我们这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秦城监狱的日日夜夜。

记得临离开秦城监狱的时候，曾与隔壁的一个难友谈起过一个构想，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心愿之一，那就是有朝一日，中国不再有因思想或言论而被拘捕、定罪的政治犯的时候，应该把秦城监狱改成纪念场所，一边是巴金先生一再倡议的“文革”博物

馆，一边是“六·四”纪念堂。让一座沉默的牢房作为历史的证人，让岁月在墙上刻下的痕迹昭示后人：中华民族为了走上民主之路，曾经走过多么艰辛曲折的道路，曾经付出多少难以弥补的代价！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尤其喜欢诗和散文。1987年9月我刚入北大校门，到石家庄附近的38军驻地参加军训，在沙场秋风中就与政治系的几名同学一起组织了兰帆诗社。回到学校后，我们还曾出了五期《兰帆》诗刊，该刊一度作为校园文化活动典范被列入党委宣传部设在三角地的橱窗里。转到历史系后，我又与同班的杨涛（在八九民运中任北大筹委会主席，此时也关在秦城监狱）等人出版《季时雨》诗刊。台湾歌星张雨生为之谱曲演唱的《没有烟抽的日子》，就是我发表在《季时雨》上，后来流传到港台的。经过1989年的纷乱，这两份刊物都停刊了，而且我手里原有的已出版过的杂志也丢失了，为此我一直引以为憾。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就是将政治上的失意，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情怀写入文学作品之中，而不是直接表现出来，这是长期封建专制下政治高压的产物。从屈原的《离骚》到北岛的《回答》都是讲求“诗言志”，以文学形式发表个人见解或进行内心宣泄。进入秦城以后，经过了从广场上的轰轰烈烈到囚禁生活的艰辛寂寞这样的大起大伏，看到了万众一心的热诚与血雨腥风的恐怖交织成的历史画卷，我感到有很多心情郁积心中，很想一吐为快。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找不到直接宣泄的渠道，只能写入诗中。写入诗中的心情是复杂而难以忘怀的，现在重新翻阅往日的一篇篇诗稿，仿佛又回到了秦城的斗室中，又一次站在夕阳斜映的窗前，用自己以手纸卷成的圆珠笔写下一行行诗句。

我在狱中先后共写了130余首各类诗句，我出狱后曾将之陆续发表在香港《星岛日报》的文艺副刊上，现在正在重新编辑整理，准备以《狱中诗文选》为名出单行

本。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从艺术水平上讲可以成集，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仍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一个青年学生在特殊的经历及环境下的那种特殊心情。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历史是如何以自己的波澜起伏锻造一个普通人的灵魂的。

我入狱后写的第一首诗是题名为“无题”的七绝：

燕赵自古多悲风，
犹记夕阳遍地红。
敢将丹心报青史，
丈夫为何不从容。

这是一首自勉诗，写于1989年9月11日。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都很险恶，我个人前途未卜，但是我坚信自己的作为是爱国的，是正义的，目的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而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我想，即使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没有成功，即使我个人所做到的与人民期望我做到的相距很远，至少在一点上我是问心无愧的，那就是：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我有这样的信心：不管面对怎样黯淡的前景，也不管会为此付出多少代价，我都可以从容面对。

这首诗我想托人带出去，让朋友们知道我虽然身在狱中，但并没有灰心丧气。当时与我同号的王新安因为问题较轻，我估计肯定会被释放，就把这首诗写在他的一件运动衣的衬领上，托他带回家去。结果有一天管教人员信手翻看我们晒在院子里的衣服，发现了这个小秘密，这一片带有字迹的衣服被剪了下来，终于没有带回去。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989年12月31日中午的情景，当时外面刮着凛冽的北风，我半倚半靠着暖气片，脑子里浮想连翩。第二天就是1990年元旦了，回首已成为过去的1989年，真令人感慨万千。这一年的风云变幻在六月四日走上了悲壮的顶峰，那么多的民族菁英，有的倒在长安街上血沃大地；有的被迫流亡异国，妻

离子散；有的仍在东躲西藏逃避追捕；有的则镣铐加身，在铁窗下度日如年，这一段

历史将以鲜红的字迹写入史册。想到这里我信手写下了一首“长歌新年抒怀”：

已矣哉，韶华悠悠，
少年豪气，长歌赋幽州。
萧瑟易水清商在，踟躅豫让凤凰台。
一唱汪洋天下事，三叹燕赵万籁白。
阳山沃野驰神骏，囚楼椽室困龙驹。
大风呼啸摧黄草，小雨逶迤浸红旗。
南乡五针松，北岭七叶树，针剥叶落影扶疏。
飘摇高下腾雪雾，动荡东西播云鼓。
今朝举杯作清酒，笑酹惆怅与江湖。
男儿当作北海浪，纵横狂呼歌八荒。
岂能畏途费逡巡，张弓不敢射天狼。
我寄大言与天下，愿安荆砾为室家。
风云正当青萍时，安能徘徊恨天涯。
陈星台，邹幼丹，汗简红书万代传。
我亦热血侠少年，应化羊角搏青天。

陈星台即陈天华，他在满清王朝末年留学东瀛，因为中国前途忧心如焚，愤而跳

海自杀。邹幼丹本名邹容，十九岁即创作《革命军》一书，为推翻满清专制大声疾呼

。这两个人为中华之振兴而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一向为我所敬仰。尤其是邹容，为《

苏报》案与章太炎双双入狱时年仅22岁，与他那种为理想献身的精神相比，那些为

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与历史潮流对抗，更不惜以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为代价

的“长者”，更应该无地自容了。

我写于1989年10月20日的一首小诗，是我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章台无处觅，灵境任我行。
身居咫尺地，心怀四海情。

到了1989年10月份以后，我在狱中的待遇较之前几个月有了一定的改善，

家里获准可以送来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在我的坚决要求之下狱方调来一个人与我同

号，每天也可以看到《北京日报》了。

这样，我开始逐渐地适应了铁窗生活。一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相对满足之后，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精神上的追求。在我看来，尽管我的人身自由被剥夺殆尽，但只要仍旧保持精神上的追求，我就仍然是一个自由人。我的肉体虽然被羁束在斗大的监室内，但我的心却可在自由的空间里任意驰骋。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溢之于笔端，就成了上面那首小诗。

当然，人在狱中，心情黯淡的时候总比在外面时多得多。在我来说，尤为使我为之心绪纷繁的就是对北大校园的思念。

我的父母都是北京大学六十年代的毕业生，父亲王宪曾在北大地质系任教已近三十年，我从小就常随父亲在燕园里玩耍，未名湖和博雅塔一直是我心向往之的地方。我一岁的时候正赶上毛泽东发出压制、迫害知识分子的口号“走五·七道路”，我们全家被迫南迁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北大教职工干校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我对北大的感情极深。记得我曾对香港《东方日报》的记者讲过：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是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一瞬间。以后的两年的校园生活更是在我的生活经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一想到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到北大，我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怅然的心情。记得1989年10月16日晚上，正值深秋季节，月明星稀，寒风料峭，辗转难眠的我想起北大如画的风光，如歌的氛围，翻身起床，借着昏暗的灯光写下了这样的心情：

秋风鸣北山，天朗寒星疏。
别情深几许，寂寞燕园湖。

其实，寂寞的又何止燕园中的未名湖呢？我那时常想，如果能让我在北大校园里服刑，只要给我看书，我宁愿被判20年。我曾对朋友说过，有朝一日历史将公正还于人民，那时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重回北大，做一个名誉学生。有人笑称我是“大校

沙文主义”，我非但不以为然，而且以此为荣。……这种“沙文主义”在我另一首小诗中表露无遗：

南望萧萧北国路，奈何燕园多歧途。
宁为未名湖边草，不作他乡掌上珠。

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出狱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北大校方，要求重新接纳我回北大念书。但这一合情合理的要求遭到原人民大学副校长，我称之为北大“伪”校长的吴树青的变相拒绝。不过我仍然会把回北大念书作为不懈争取的目标，因为我太热爱北大了。

思念，也是我狱中心情里很重要的一部份，这不只是对生活的思念，还有对朋友的思念，对家人亲情的思念，对往日岁月的思念等等。象我这样被单独关押，更容易增添这种心情。1990年8月21日那天，我写下这样的句子：

寒蝉夜瑟，香草暗飘。
临窗对月，雨过天潮。
野籟风凉，我独寂寞。
思彼郢人，何处今宵。
木叶夕照，维山之青。
落霞千里，为水之萍。
江湖风雪，于彼长亭。
忍顾旧堤，山水飘零。
殷哉殷哉，冰心素情。

尽管间或有这样近于消沉的心情，但我并未因此伤感而意志低迷。我怀念入狱前自由时的一切，但我绝不为失去一切自由而感到懊悔，我也从未在预审人员面前流露出这种心情。刚入狱的时候我就曾经给自己规定过：“在对方面前永远保持微笑。”三年七个月以来，我始终以快乐的精神状态与各种人周旋。单独关押也好，限制书籍也好，无非是想让我陷入消沉之中不能自拔，如果我真的因为孤独而失去健康的心态，岂不是助纣为虐吗？

在狱中时，想的最多的当然还是八九民运，及其给中国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据我所知，当时对于这个问题，外界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六·四”事件必将彻底激化中共党内及社会上的种种矛盾，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中共开枪无异于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政府的更迭指日可待，……。这种观点显然过于乐观。

胡平说的不错：暴力往往引起反抗，但过于强大的暴力带来的也会是沉默。中共苦心经营四十年的成果、人民对暴力的恐惧、客观基础的不成熟……，种种条件决定了中共的统治依然维持着，虽然不稳定且失去了合法性，但毕竟牢牢地把握着国家机器。

还有一种观点又显得过于悲观，他们认为“六·四”事件的发生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发生了大的倒退，国内菁英死的死，抓的抓，逃的逃，民主力量受到重大损失，上层保守力量重占上风，这一切使中国进入一个漫长的黑暗时期。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把民主化进程的漫长曲折估计得太低了。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民主化注定要走过一段艰苦的历程。但是首先要看到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次也要看到，这个过程从总体上看仍在加快。我在狱中时刻注视着外界的动态，我感到当局尽管一再嘴硬，但对于开枪一事，实际上还是很心虚的。从处理结果上看，也没有继续大开杀戒。以中共的历史作对比，面对八九民运这样空前鲜明的反对运动，他们做出的强烈反应是空前的，而达到的社会效果之差也是空前的。这充分说明，时代毕竟是在前进，社会毕竟是在进步。所以我在狱中，对于自己的信仰，对民主运动的前景一直保持着充足的信心。我曾在1990年3月13日赋诗一首表示我的信心：

巨鹿西楚威犹在，乌江滚滚水无言。
不信云崖堪千载，要看东海化桑田。

社会变化总是比自然变化快一些，连东海都可以化为桑田，何况社会的发展呢？

项羽称霸之时可谓雄矣，但一朝失去民心，不是短短两年就自刎乌江了吗？在这种风

云变幻的动荡时代，我们理应把目光放远一些。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在1990年8

月27日写下了一首“七律·抒怀”：

卓立天山云上观，风雷鱼龙共盘旋。
夕阳血洒黄昏道，惊涛潮卷奈何天。
萧萧春风别巢南，漫漫冬雪祭实丹。
知汝花开应不误，提壶只待向中原。

这里“巢南”是本世纪初民主斗士陈去病的号，我用以代指那些流亡海外坚持奋

斗的朋友们；“实丹”则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烈士周实的字，我用以代指那些为争取民

主而献出生命的朋友。最后一句出自周实的一首诗《民生报出版日少屏索祝爰赋四章

》之一：“千万亿年重九日，自由花发好提壶。”

这种信心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自我勉励。每当我在狱中感到苦闷难

熬的时候，就常常告诫自己：时间是最公正的大法官，我应该相信时间。记得199

1年6月13日，我写过一首小诗“相信”。当时我正被关押在二监的禁闭室中，面

对的是闷热、潮湿、狭窄的居住环境和无边无际的孤独，我用自己的声音告慰自己：

相信历史，
历史是青铜掘出的隧洞；
相信现在，
现在是通往大海的航道；
相信未来，
未来是与人类同生同灭的
一首唱不完的民谣。

除掉哀伤和沉默，
我们相信一切。
因此在黄昏和拂晓之间，
我们能体味到：

什么是时间的报酬，
什么是期待的欢乐。

∞ ∞ ∞ ∞ ∞ ∞ ∞ ∞ ∞ ∞

后记

《狱中回忆录》全部完成了，我却有着一一种难以排解的遗憾。我遗憾我没有在书中表达出我一直想表达出来的困惑，为什么一个人会为了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

对这一问题最常见的可能是指向政治制度的：专制者不允许你去追求自由。但是所有政治问题都仅仅是表面问题，在其背后一定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所以仅仅指责政治制度是解决不了我的困惑的。因为在一个民主制度的社会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为了追求自由这一目的必须与社会和公众发生关系，在这种过程中，如果他取得有利于追求民主这一目的的效果，就必须顾及社会与公众的错综复杂的价值判断，这意味着在某些方面他不可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及行为。这不也是为了追求自由而丧失自由了吗？

我在狱中反复思考但一无所得，至今仍被之困扰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能不能不这样？

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历史一手造成的，是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上。对这一点，是没有人比我自己更清楚的了。我有这种自信：与同龄人相比，我在很多方面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但是这种自信不会使我狂妄到认为自己配得上现在我正占据的这个位置，配得上外界给予我的评价和期望。这使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宿命感：既然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一步，我就应该服从历史的安排，这是使我决心出狱后为推动政治民主化而努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对自由的本能爱好。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

与大革命》中说：“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
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
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我想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透过
民主运动，我追求的是自由本身，因为就目前大陆现状来说，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来自
于政治。

可是政治与自由在目前来说，并不能完全融合，甚至民主本身也与自由存在摩擦
，夹在其中的就是一个困惑的追求自由者了。这个矛盾虽然潜伏于心灵之中，但却是
一目了然的：我为了充分享有人的各种自由而投身政治运动，但是政治运动需要人在
某些方面限制自己的自由。我在狱中思考这一问题时，曾把自由分为内在的心灵自由
和外在的行为自由两种。就前者而言，放弃外在的追求就可以轻松地获得并保持；就
后者而言，放弃追求就永久不会拥有。而二者又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所以我没有解
决这一困惑。

也许我将永远无法摆脱这一困惑，也许命运的变幻莫测会以强力帮我解除它。但
我仍然感谢三年七个月的狱中生活，因为是这一段岁月使曾在天安门广场上拥有极大
自由的我，有机会面对极大的不自由。在这二者转换中，我感受到了上述困惑，这使
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么普通的，甚至是处于一种多么富有悲剧意味的境地之
中的人，因而永远不会迷失自我。

王丹 1994 年 4 月 7 日于北京

∞ ∞ ∞ ∞ ∞ ∞ ∞ ∞ ∞ ∞

岁月苍苍
(王丹母亲王凌云的回忆)

光阴荏苒，岁月苍苍。1989 年那场风云激荡的民主爱国运动过去已经五年了

，我虽然没有参加那场运动，但作为运动参加者的母亲，却和孩子一起，经历了运动以后的凄惨风雨。有几位朋友劝我将所经历的事情写出来，为后人留下点历史资料。

.....

一，在绝食的日子里

1989年5月13日，北京大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我们确知王丹已经在广场绝食，而且是发起人之一。我们理解孩子们的行动，是出于不得已，才以生命相抗争。作为父母又心痛孩子。五月的北京，虽是初夏，但夜晚还是寒气袭人。想到孩子们饥肠辘辘，怎么能耐得住这般寒冷，真不知为他们做点什么好。

.....

由于我工作的博物馆大楼和广场毗邻，又因为我的孩子参加了绝食，所以自5月13日起，二十个日日夜夜，心系广场。随着绝食天数的增加，救护车的呼啸声也越来越密，到最后一天，竟每隔两分钟就有一辆救护车开出。救护车载着生命垂危的学生，奔向北京的四面八方。凄惨的呼啸，是抗议，也是召唤，各个阶层的人们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

5月19日清晨，我们在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见到了孩子，只见他满面黑灰，疲倦不堪，身上不知穿了一件谁的皮夹克……。此时他还不知道上午即将同总理李鹏等人对话。

19日晚上，广场上传来消息，学生们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此时，我正在我们博物馆北门传达室里，听到这一消息，悬着的一颗心稍稍放下来一些。黑暗里有几位大学老师来借电话，通知学校说学生们已停止绝食，要求校方赶快送稀粥来。...

...

当日晚上，李鹏在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宣布这次学潮是动乱，北京要实行军事戒严

，广场上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还没等稀粥送来，有的学生又要绝食。我们意识到，结局将是凶多吉少，只有尽快撤离广场，才可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二，“六·四”之晨

五月末，王丹和北大部分同学已返回学校，我紧张的心情稍稍放松了一点，焦急地盼望着留在广场的学生赶快撤离，早日结束那种危在旦夕的局面。

……六月三日晚饭前，王丹和几个同学来家。晚上，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反复播出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要求人们待在家中，不要去广场，气氛十分紧张，我要求他们不要去广场。晚十时，他们离家返校，岂料此一去，就是三年另七个月，直到1993年2月17日才重踏家门。万万没想到，那一晚竟是生离死别。

他们刚刚走出家门，便从西南方向隐隐约约传来枪声。枪声由远及近，一阵紧似一阵。一阵比一阵密集的枪声，俨然是一场战争。奇怪的是，枪声为什么由西往东，由远及近？即使这样，也万万想不到是军队在向人民开枪。大约四时，一队学生从我窗前的马路上呼喊而过，听到喊：天安门广场已经开枪，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我顿时明白了一切，终究还是用血的代价来结束这场运动。

天亮了！一位邻居在胡同口看到一队返校的学生，有人身上满是血迹，回家大哭。这一天，有几位亲戚和朋友冒险来我家，询问王丹安危。我的一位老同学，六月三日出差到北京，住在军事博物馆对面一家招待所里，他目睹了北京发生的一切。四日早晨，他竟步行，穿过一辆又一辆正在燃烧的军车，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戒严部队的岗哨，走了两个小时，来到我家。脚还未踏进门，开口便问：“丹丹怎么样？现在在哪里？”……。是他们为我们分担了许多恐惧和忧愁。

三，黑云压城

六月五日，偶而还能听到枪声，城内有几处飘着浓烟，这是军车在燃烧。我在楼

下稍稍一转，人们便围上来，关切地询问王丹的安危。听说人民大学的学生被打死，清华大学设了灵堂，北京大学的南校门贴出了“血沃中华”、“惨绝人寰”的挽联，市民们在抢购食品。我的心头布满乌云，儿子下落不明，我们一天没吃饭。傍晚，刚做好晚饭，一位同事来报告：听说某一家大医院有五具尸体没有人认领，其中有一具身穿黑色T恤衫和白裤的像是王丹。他含着热泪向我要了丹儿的照片，准备辗转托人去辨认。同事走后，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对着刚刚做好的饭菜，无法下咽。

这几天，同事们和邻居建议我们到外边住几天，躲一躲风头，怕三更半夜戒严部队登门搜查，我受不住惊吓。……。

七日晚饭后，我们来到新街口豁口地铁站，满眼都是学生，象一群惊魂未定的小鸟，没有了往日的嘻笑，个个表情苦涩，无可奈何。他们之中或许有人经历了天安门广场血雨腥风的夜晚，也许有人被迫走出了图书馆。我坐在他们中间，听着他们的议论，止不住热泪横流。多么好的一群青年，他们满腔的爱国热忱，得到这样的回答，苍天何在！

走出朝阳门地铁站，象到了另一个境地。路上行人稀少，交通要道和立交桥旁，都有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戒严士兵站岗，一片战后肃杀景象。令人不解的是，两人站岗竟背对背，三个人则朝三个不同的方向，好象是在敌国站岗。到了东大桥两辆无轨电车被烧毁，车上赫然挂着两个大花圈，这番景象，令人肃然。

来到同学家，受到热情接待。他告诉我，六日上午他看见了小丹，他追上去要给他一点零用钱，小丹没要。这是一个令人稍稍宽慰的消息，但此去何方？却是茫茫。

住在这里的前几天，每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里，连续播出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告，严令高自联、工自联的为首分子自首，又播出了对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的

通缉令，在每天的电视屏幕上接连出现令人不忍目睹的画面。

北京的初夏温馨宜人，而今年却与往年不同，北京的上空阴云密布，寒流滚滚。

我在同学家足不出户，呆呆地从早坐到晚。他们劝我出去走走，我说我有坐功，要是坐牢，一定可以把牢底坐穿。这本是一句戏言，岂料不幸而言中，不久真的坐了牢，这是后话。

四，收看通缉令

六月十二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播音员用急速的声音播出了公安

部转发的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令。猛然间，丹儿的形像赫然出现在屏幕上，名列榜首

。我极力控制住情绪，听完了21名学生的名字，想来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早在运动

中就听人传言，一份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单已经摆在了邓小平的桌上，为首的就是王

丹。

这是一个月黑之夜，我不明白为什么杀了还要抓！想到六十多年前，段祺瑞下令

在北京屠杀请愿的学生，酿成“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屠杀之后，当局也曾对被指控为幕后操纵者的北大教授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徐谦等

人进行了通缉。现在这样一份名单，公诸于世，不知国人作何想法。孩子现在何处？

他知道被通缉吗？通缉令中王丹的年龄和籍贯都错了，二十岁说成了二十四岁，山东

人说成了吉林人。有人认为，年龄是有意弄错的，这样大规模的公开通缉犯名单，为

首的竟是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大孩子，岂不是大煞风景？

孩子被公开通缉，其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而喻。既然如此，我们婉言谢绝了主人的

挽留，于6月15日回到了家。

五，被抄家

六月三十日，听到敲门声，开门进来四个公安人员，后面跟着一个头戴钢盔，身

背步枪的戒严部队士兵，待把他们送上楼后，他转身下楼，估计是到楼口警戒去了。

来人向我出示了公安局的搜查证，问我哪一间是王丹的住房。我告诉他们，王丹考入

大学后，便住在学校，家里没有他的住房。他们又问，哪一张桌子是他的，我只好将

他上中学时用过的那张桌子指给他们。他们很轻便地就撬开了抽屉上的锁，搜查一切

。我坐在门口，目睹这一切，木然置之，没有恐慌。因为我很坦然，孩子没有做贼，

无需心虚。抽屉里究竟放了些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想运动期间的材料，不会放

在家里，家里无非是他中学时的笔记本之类的东西。后来才知道，他们果然从家中抄

走了他的几本日记，以后，他们曾就此大作文章，我悔之莫及。

抽屉里的本本和纸片被搜索一空。他们又搜装衣服的柜子，从中搜出来的竟是他

上小学时候玩的画片和一堆小人书。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想打开

沙发看看，征得我的同意后，他们打开沙发，反复拍打。原来他们怀疑沙发里可能藏

有武器。……他们临出门时，丢给我一句话：“王丹要是回家，到公安局报告一声！

”

六，带病入狱

七月一日下午，小杨来送信，说王丹已于前几天回到北京，住在一位朋友家里。

果然不出所料！来说他已手无分文。他爸爸立即去银行将家中仅有的一千余元取出

，交来人带去，并请小杨转告他，好好待在住处，不要乱跑。我们想，既然回到北京

，无疑是自投罗网，再想逃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能躲一天是一天，躲过这个风头，

即使被抓，也许会好一点。

七月三日上午，大约 11 时左右，敲门进来五、六个陌生人，说是公安局的，要

了解些情况。我说，就在家谈吧，他们说最好去公安局谈。此时，王丹的父亲已经

回来。他说，他妈身体不好，正在吃药，还是我去谈吧！来说，他母亲了解的情况

多一些，还是让她去吧！还向他保证，一会儿就回来，我们还用这辆车把她送回来。

车开出后，我觉得不对……车子开进一座大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几个大字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来人叫我下车，过来一个女警察，说是要搜身，只搜走了一把钥匙。……带我进了一间过厅，门卫森严，一股冷气迎面扑来。办完登记手续后，听见说带到“西四”去，原来是西边的通道第四号牢房。带我来的人中一个胖胖的人带有歉意地对我说：“你就在这里啦，我们也是执行任务。”

进入四号牢房，这是一间大约只有八、九平方米的小屋，地上已经躺满了人，此时正值午休。见进来一个陌生人，躺在门口的一个小姑娘审视了我一会，问我：“为什么事进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是王丹的母亲吧！”话音刚落，躺着的人几乎同时坐了起来，她们好像见了亲人，一个个自我介绍，问我话的那个姑娘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有的说，我是市民敢死队的；有的说，我是工自联的播音员；有的说，我在广场见过王丹。看着这一张张娃娃似的脸，我不由得落下眼泪。多好的孩子啊！她们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了我，劝我躺下休息一会，下午可能就要提审。就这样，我糊里糊涂进了监狱，留下了一页难忘的历史。

七，提审

这一天下午二时左右，来人将我带走。通过小院，来到一座三层楼上，屋里高高的台子后面已经坐了四、五个人。一进门有一个圆形墩子，是供受审人坐的。墩子旁边放着一只喝水杯，显然是供犯人用的。这分明是审讯室，哪里是什么谈话。……等我一回到看守所，早有人等在那里，拿出一份收容审查单让我签字，我问根据什么对我进行收容审查，回答是根据国务院56号文件。事已如此，也无需再问。

回到牢房已是下午5时左右，第二顿饭（一日两餐）已经开过了，姑娘们为我留

了一份饭菜。我端着碗发楞，如在梦中。晚上十时以后，便听到铁门外喊我的名字，这是叫我去提审，没有大事一般夜里不会提审。一上来，主审员就用威逼的口气问我

：“你想知道王丹的下落吗？”我一听心中暗暗一惊，明明是在挑衅。我一言不发，

他见我不说，便非常得意地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他就在我们北京市公安局。

”显然，他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利用母亲的弱点，想从我口中得到点什么。不知当

时我怎么那么冷静，非常平静地说：“那好啊！这我就安心啦！”他大概没有料到一

个母亲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会这么平静，过了好一会他才说：“是啊！是啊！他到处

乱跑，你也不放心。”之后，他又责问我，王丹回到北京，你们托人给他钱的事下午

为什么不交待。我说：“送钱是我让送的，与别人无关。”他们逼我承认给钱是资助

他潜逃，我拒不承认。我说明我们知道孩子已回到北京，就难逃出去了，给钱是想让

他暂时躲一躲风头。他生活尚未独立，给他生活费是作父母的义务。

八，初尝阶下囚的滋味

既入监狱，就要遵守监规，不管你承认与否，你已经作了阶下囚。我尝到了阶下

囚的滋味，能有机会体验一下这种生活，却也机会难得，所以我至今无悔。……。

九，一块榨菜

由于6月10日起北京大肆捕人，各监狱都满员，这个看守所也不例外。每个号

子原定员是九人，如今男号多达三十余人，女号最多时也有十七、八人。人员严重超

额，生活待遇就更差，每日两餐，每天晚上供应三杯开水，不管人多人少。有一天，

一个女孩子被叫去打扫楼道，意外地在地上发现了一块榨菜，喜出望外，赶快偷偷捡

起藏起来。她们把这块又黑又硬的榨菜洗净，吃饭时，每人一小块，我也分到了一小

块，越嚼越觉得有滋味，真是其味无穷。……

十，为难友讲历史

在这样一个特殊集体里，九个人是因为天安门事件被收容审查的，一个是刑事犯，是专门调过来监视政治犯的。九个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研究生、保育员、粮店售货员、美术工作者、个体户等。她们中年令最大的32岁，最小的20岁，大都是广场上的积极分子，正直、热情，但对这场民主运动了解不深，对中国的历史知之者就更少。她们知道我是学历史的，晚饭后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里，便要求我给她们讲故事，我就给她们讲历史。从孙中山讲到袁世凯；从康有为、谭嗣同讲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了中国的民主、富强，作了不屈不挠的奋斗；从袁世凯称帝失败，说明民主是中国历史的主潮流，任何势力都不可逆转。我还向她们讲述历史上的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讲到八九学潮，说明历次学生运动都是爱国的。

这些孩子都称我为老师，此事引起了管教人员的注意。不久，就把我从四号牢房调到了六号牢房。

十一，为受罚者扇扇子

十二，幻觉

自己身陷囹圄，心却时时惦念着儿子……。

在看守所，不时传来犯人挨打的惨叫声，就觉得自己的心在被震撼。儿子会挨打吗？他挺得住吗？不敢再想下去。

更为担忧的是，他年轻幼稚，还是一个没有涉足社会的学生，能经得住严酷的审讯和威逼利诱吗？如今，他还没有涉足社会就走进了监狱，这一株生长在温室里的未曾受过风雨的幼苗，能经得住这般狂风暴雨吗？不知什么样的厄运在等待着他，为他的前途焦虑。夜阑人静，心潮起伏，不能成眠。天天暗地呼唤：“儿子，你在哪里？”

母子双双身陷囹圄，思念之情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能是神灵的安排，有一

天中午，正在午休，十分安静。我刚刚入睡，突然听到铁门外有人喊“妈！”声音凝重悲凉。“他怎么来了！”我腾地翻身坐起。侧耳再听，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夥伴们的酣睡声，原来是幻觉。屋子里显得格外寂静和辽阔。那凝重悲凉的喊声，好几天都在我的耳边回响，久久令我回味。

十三，左腿罹病

九平方米的号子里，最多时住了17个人。吃饭、洗衣、洗澡、大小便都在其中。大铁门紧闭，窗子又高又小，空气不能流通，空气之污浊、潮湿可想而知。晚上便睡在这潮湿的地板上，人多拥挤，每人只有两尺宽的空间，只能侧身而卧，偶而平躺几分钟，就觉得是天大的享受了。我只能向左侧身，长期压迫左腿。大约七月末，旁边的一个女孩发现我的左腿明显比右腿细。我仔细一看，果然如此。以后，左腿逐渐无力，伙伴们劝我立即向狱方提出看病。我想这种病不疼不痒，他们不会重视。我对她们说：“不要去求他们，有朝一日用担架抬出去，看政府脸上有什么光！”有一次放风，我走路明显感到不便，左腿无力，跟在队伍后边。管教发现后问我怎么会事，我以实情相告。

她们带我到医务所看病。后来从外面请医生，经诊断，说是神经性肌肉萎缩，只有到外面才能治疗。她们一边积极向上反应，一边设法照顾我。为了多晒太阳，一有空就带我到院子里坐一坐，有好奇的人知道我是王丹的母亲也过来聊聊天。有一个男警察看看周围没有人，便走过来对我说：“我在清华门见过王丹，是一个挺有气质的小伙子嘛！”管教们还从八号调过来一个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神经科的在职研究生（政治犯），每天为我按摩。由于长时间的关押，她身体虚弱，天气又热，每次按摩，都大汗淋漓。我实在不忍心，便瞒着管教，让她隔日按摩一次。

十四，取保候审

七月三日到这个看守所，当天提审两次，此后再也没有人过问。后来从管教口中才知道，根本就没有给我立案。既不立案，又不释放，她们对此也愤愤不满。本来就无罪，又何从立案！大约在八月二十日，把我叫到提审大楼，提审的人问了王丹回京后我给过王丹一笔钱的情况，又说了以后要同王丹划清界线之类的话。

八月二十三日，提审的人说打电话找不到我家里的人，问我女儿单位的电话。

我满腹猜疑，一家四口，两口蒙受冤狱，还能再会怎么样呢？管教突然打开铁门，喊：“王凌云，快收拾东西！”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伙伴们一下子都跳起来，手忙脚乱地帮我收拾东西。有一个女孩，在一块硬纸板上用指甲刻下她朋友的电话号码，偷偷塞到我手里。管教站在门口，不许说话。我抱着一个小包，用目光和伙伴们告别，蹒跚地走出牢门。

在办公室，一位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向我宣读，说根据法律某某条，我可以取保候审，接着，他向我宣布两条纪律：一，不许逃跑；二，不许自杀。他大概也觉得面对这样一个行路困难，身体虚弱，年过五十的老太太宣布这样的纪律，犹如演戏，所以他一边念一边笑。我也觉得好笑，回答说：“我的腿已经这样了，走路都很困难，怎么逃跑？至于自杀，我还没有想过。”

办完手续，我随女儿走出这座大门。七月三日中午懵懵懂懂地进来，也是中午，糊糊涂涂地出去，始终没有被告知所犯何罪。

这座监狱，清朝的时候是存放枪炮的地方，这条胡同因此得名，为炮局胡同，位于北京城的东北方向，距国子监不远。清朝末年改为监狱，延用至今，现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十五，故乡所闻

十六，第一次会见

回到家，全力以赴治腿病。在中医院找到了一位专家大夫，服了200多剂汤药，病情不见好转。老大夫表示无意再治下去。不得已，我以实情相告。老大夫听后的表情至今难忘，又是惊讶又是同情，他连连向我表示：我一定治好你的病！中医治病注重心情的好坏，此后，他每次都谆谆开导，我非常感动。后因诸事繁多，我便主动终止治疗，没有遂这位老大夫的心愿。至今左腿仍感麻木，从此落下病根。

1990年1月23日晚，通知我们，春节前安排一次同王丹见面，同时还特别告诫我，我被关押的事不要告诉王丹。我答应不讲，以后一直没有对他提起此事。

我和他父亲两人被人带着，来到一个大房间，丹儿站在门口迎接，他父亲激动地喊了一声“小丹！”孩子就站在面前，我倒冷静了许多。他走过来让我们坐下，第一句话就说：“妈，你可不要哭！”我并没有哭，半年多来，当着公安人员的面，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和孩子相对而坐，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本来就瘦弱的孩子更加瘦了，面如土色，两手像纸一样惨白。四十分钟的会见很快就过去了，好象什么话都没说。临别时说了一句：“但愿我们不久再能见面。”预审员和一位工作人员送我，到第二道铁门外，我因左腿麻痹，艰难地与他们同行。……

十七，寒风萧萧

十八，为律师奔波

十九，开庭前后

二十，大年初二闯秦城

二十一，寒春苦夏

二十二，接孩子出狱

苦难终于到了尽头，1993年2月17日，王丹终于获得了自由。王丹坐牢期间，释放他的消息，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几起几落。我们也几度期盼，几度失望。

1992年12月16日，我们一家到二监探视。我有意试探他，说：“外面时常有传言，说你已被释放，也有朋友信以为真，到家来看你。”他说，他自己已向当局表示，绝不接受有条件的假释。儿子的这句话使我感到欣慰。讲心里话，作为母亲，何尝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早日结束这种牢笼生活；但从理性上讲，深怕孩子熬不过这最后的岁月，特别是听到某某已被释放，会接受官方的什么条件，换取自由。有他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鼓励他再坚持六个月！用苦难换取无悔。

1993年春节前后，外面又传王丹被释放……

二月十六日，是规定的探视日，我和他父亲，依然是大包小包，因为二月二十六日是他二十四岁生日，故多带了些食品。途中大雪纷飞，会见时他告诉我们，二月九日，有关方面向他说，准备对他假释，理由是：能守监规，又是青年学生，父母探视辛苦。看来，他们的方针已定。听此消息颇感突然，也没有大喜过望。四十多月都过来了，谁还在乎他们提前一两个月。

二月十七日，突然接到二监电话，说下午要到我家，要我回家等候。等到二点半，来接我们的是一辆警备车。车到二监，他便告诉我们：今天下午释放王丹。

我们在接待室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等到下午五时左右，外面传话说：王丹出来了！只见停车场上已停了好几部小汽车。二监的大门已经聚了一些人，录音机、照相机已经摆好。我原想他一定是扛着大包小包走出大门，谁知不一会便远远看见他两手空空，一支手打着“V”字形（表示胜利）的手势，左右由两警察陪同走出了北京市第二监狱威严的大门，跨进了自由的世界。

两名没有通报姓名的国内记者过来采访问：“你们的孩子出来了，很高兴吧？”我们停了一会，才淡漠地说：“高兴！”他又问我：“作为母亲，你对儿子今后怎么

打算呢？”我说：“我希望政府能允许他回北大继续读书。”

我们刚刚摆上饭，合众国际社的一位记者捷足先登。他说下午新华社发了消息，那时我们尚未离开监狱。不一会，记者一批接一批，象潮水一般无法阻挡。

孩子回家了，回到了阔别三年另七个月的家。在他前进的道路上还将布满荆棘。

□ 李淑娴植字摘录

代王丹领N E D民主奖

• 李淑娴 •

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受王丹母亲的托付，为在狱中的王丹领奖。当我在电话中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她要我转告N E D以及所有关心王丹的朋友们：

（1）衷心感谢给王丹颁奖，这是对他坚持信念的认同以及对他的鼓励。
（2）感谢所有对他关心的组织与人士。
（3）王丹在最近一次的家人探监时告诉她：“不管历经多少曲折，我仍然坚持对民主追求的信念。我要象一棵挺立的大树，面对现实，不会弯曲。”

作为母亲，王凌云希望各组织和所有正义的人们继续关怀王丹——她的因长期系狱而体弱有病的无罪的儿子。

在“六·四”前后，中共当局曾说我是指使王丹的黑手。我想，我还够不上有这样的殊荣。当然，同在北大，民主与科学的信念，一代向一代地传承。

我第一次遇到王丹，是在1988年“五·四”校庆的首次“草地沙龙”集会上，当天讨论主题是北大的传统。主要发言之后，我看见一位生得清秀带着稚气的大孩子文雅地挤到前排说：“我之所以考进北大，就是它的传统——‘民主与科学’吸引

了我。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必须发扬这样的精神，我愿为此献身。”之后，我才知
道他叫王丹。不久，他特地找我，告诉我他已经从北大国际政治系转到历史系。他认
为，一个民族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才会更好地进步，他有志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
近代史中“反右”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件。他听说我在那场运动中被定为“右
派”，
特来采访。我被这个孩子的真诚感动了，要知道当时都认为国际政治系毕业后有更好
的出路。从此我们成为朋友，我也告诫他，先把学业完成才能更深入理解历史。我希
望年青一代能比我们更顺利地走向生活。

然而王丹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此后，他热心参与草地沙龙的活动。刘刚毕业离
校之后，王丹继办起“民主沙龙”。他用自己不多的零用钱买了纸和钢板，铁笔，自
己刻钢板，创办自由的学生刊物并免费分送各处。本来，这都是北大校园内自然组成
的一部份。“反右”之后，曾受压制，但北大这片校园，不是用强制可以压住的。王
丹心地善良，性格开朗，带着童真的稚气；坚持自己的信念又能谦逊地听别人意见；
有斯文的书卷气，又勇于亲自动手去作；他不仅关心校内事件，也请校外人士来到沙
龙演讲，座谈。这使得民主沙龙逐渐成为在校内参加人数最多，最活跃，最出名的学
生自办社团。所有活动既不违校规又符合宪法，校方无法公然禁止，就雇了人，专门
撕民主沙龙活动的海报。

1989年初，北京知识界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几封公开信发表之后，大
大触怒当局。但是，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大部份年青人，不知道魏是何人，何事被捕
。这是中共一贯的愚民手法，使人民失去记忆，由统治者任意篡改历史。王丹在魏京
生被捕日前后，召开有关1978年西单民主墙的沙龙，并请来任畹町等人，魏和任
都是民主墙事件的参与者，都为此被捕入狱。之后，王丹和民主沙龙陷入更困难的境
地。

这就不难理解，在1989年4月15日之后，王丹成为天安门学生自然推崇的领袖。他温文的外表下，怀有一颗热诚奉献的心；他谦虚，能听取不同意见又在原则上坚持；他有明晰的理性思维，又有诗人的气质；他易于和人相处，有极强的亲和力和魅力。因此，当局把他排在21人名单之首。若说缺点，是他还太年轻，对困难估计不足，对当政者的残暴估计不足。但是，他是第一个事后能对这流血事件作沉痛的自我反省的领袖人物，虽然“六·四”之前他已不是广场指挥，虽然“六·四”屠杀的罪魁当然是中共当局。他在《狱中回忆录》中写道：“……我作了死的准备，而且自信即使真的面对枪口，我的内心仍会保持平静，因为我没什么可后悔的。……但对倒下去的市民和学生，我的内心深处有着沉重的负疚感，因为我本来应该第一个倒下的，但却成了生者……”

他的反省决不是改变信念，第一次出狱后，他继续积极地做有益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事。于是当局第二次再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他11年重刑，并有意把他送到辽宁省服刑。

王丹的全家受到深深的伤害，尤其是他的母亲王凌云。她也是北大人，历史系毕业，经历过反右，但她没有阻止孩子走一条困难的人生道路。在王丹第一次被捕同时，当局也无理拘留了她，在看守所的牢房里被关押五十余天，造成左腿肌肉萎缩，长期麻痹。现在王丹关在离家遥远，交通不便的辽宁。她以病弱之身，绝不放弃任何的每月探视机会。不管经济上多困难，不管夏暑冬寒，她和家人都奔忙在北京—辽宁的交通线上。今天，在我们开会的时刻，她又顶着中国东北的风雪，走在天寒地冻的道路上，去看儿子，她说她会把这消息告诉王丹。这种对全家的磨难，无疑是对王丹的精神折磨。王丹在《狱中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我给自己立下诫律，决不

在当局面前掉泪。我入狱近一年，才允许我第二次见到妈妈。我不明白，母亲一年之

间，原来满头的乌发白了一大半，皱纹也添了很多，走路也不俐落。当我看着披着白发的妈妈，拖着蹒跚的步伐走远了，我强忍的泪水禁不住流满衣襟，我狠狠地咬住嘴唇以至出血才没有哭出声来……我的双亲，从来不拉我后腿，虽然为我担惊受怕，但他们知道，为我吃苦，正是为了以后千千万万家庭，不再为孩子追求民主入狱而吃苦，他们不愧是北大这块民主土壤滋养出来的毕业生……。”

当然，民主与科学不仅是北大的传统，它是这—个世纪来多少中国人不惜牺牲去追求的。

中国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得十分艰难。共产党在获取政权之前以民主的口号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实际上他们早在延安时代就已经以言定罪，以言杀人。1949年之后的历次全国性大的政治运动，多是向民主开刀：

1957年的“反右”，官方承认的数字是划了55万“右派”，多数是年轻人。北大当时学生约为八千，人民日报承认，划了约870名学生右派。许多右派的主张都集中于言论自由，政治民主。这55万右派，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绝大部份失去正常工作，失去学业。

这些事都发生在封闭的年代。人们盼望，打开国门之后，应当有进步，但是并不如此。当年全国最著名的青年右派是21—23岁。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王丹也是在他22岁时（1991年）被判刑。

中国一天不民主化，专制就总是威胁着人的天然权利。但是我相信理想，—百年来热血青年的追求，民主和自由，一定会在中国实现。特别是，中国的自由民主追求，已唤起了世界的注意。王丹的背后，有着整个的民主世界！

谢谢NED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谈王丹的故事，我将把所有大家的关心和鼓励通过他的母亲带给他。2月26日是他的生日，让我们在万里之外，在他最珍爱的自由的

空气里，为他祝福。

□ 寄自美国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附 1: 禁网新闻平台 (禁闻禁书禁片) 网址一 <http://tiny.cc/jinnews>

附 2: 禁网新闻平台 (禁闻禁书禁片) 网址二 <http://vur.me/jwnews/jw/>

附 3: 网址三 <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jwnews/jw.html>